

巴別塔之磚

Liam Matthew Brockey, *Journey to the East:
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, 1579-1724.*

Cambridge, Massachusetts: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
2007. xii+496pp.

祝平一*

自從上帝摧毀巴別塔(Babel)之後，溝通就一直是人類的問題。因此有了西方人到世界各地去傳遞上帝的福音；也因此有了中西交流史這個行道。Brockey 也像其他在地球上努力的人們一樣，把巴別塔之磚一塊塊疊回去。對信眾而言，這徒然的辛勞意味著人們總有一天能親聆上帝綸音的渴望；對學者而言，這枉然的事業有如建立豐碑，只合紀念自己的生與死。

Brockey 的《東遊記》記載的正是耶穌會士來華與中國人溝通上帝的歷史。書名取自《西遊記》的擬喻：玄奘和其神通廣大的諸弟子西行求法，將佛教的真諦傳入中國；一如明末耶穌會士來華傳遞上帝的道理（頁 3-4）。只是玄奘(602-664)西行求法時，佛教在中國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，而耶穌會入華的年齡則要到這個世紀才有這麼長。然而擬喻之失，無害 Brockey 書寫耶穌會士來華的壯遊。

Brockey 所摶成的巴別塔之磚，材料並不取自中國。Brockey 也自承他將耶穌會士的東遊當成歐洲天主教史的一部份（頁 5）。因此，是耶穌會士在

*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

歐洲的訓練，培養了他們以文法研究中文的能力；是他們以在歐洲組織信徒的方式，放牧中國的羊群；最終也是歐洲其他天主教團和聖俗的衝突，使耶穌會在華的努力功虧一簣。雖然場景在中國，Brockey 講的卻是個不折不扣的歐洲的故事。因此書中的三教成爲「三學」（頁 90），皇親國戚變成「王府」（頁 45），也就不足爲奇。

然而正因 Brockey 的歐洲觀點，本書方成爲摩娑中國磚塊學者的他山之石。雖然他試圖從歐洲重建巴別塔，或不免歐洲中心主義之譏。然而面對 Brockey 的論述，同行的中國史研究者應思考的是，能否從中國觀點說一個像他一樣好的故事？而不是東拼西湊，在別人的磚塊間和稀泥，無望地期望統合中西，重建巴別塔。

本書第一部份是耶穌會士入華的編年史。雖然學者常會爭論歷史詮釋的意義，所幸歷史上的大事件總大致相同，爲這一行提供了差強人意的客觀性基礎。然而歷史研究不是大事記，魔鬼總是存在於細節裡。Brockey 從里斯本與羅馬挖出來的一塊塊巴別塔之磚，當然不是爲了要重覆別人的大事記；如此，學者自我紀念的行爲，就失去了紀念的意義。隨著磚塊的纍疊，Brockey 引領讀者爬據越來越高的視野，俯瞰四百多年前入華耶穌會士的窘境。

耶穌會士初入中華，首先面對的是如何在異文化中找尋自己的定位。要以說法的佛教僧人露面呢？還是以儒者的面貌現身？他們選擇了後者。雖說耶穌會以大學體制訓練成員，且他們也常以「進士」自比。但「儒生」畢竟是俗士，而不婚不宦的耶穌會要置入這個異文化的身分，自多柄鑿。如此不但模糊了聖俗的界線，也引發日後教士、官員、學者間身分不明和是否遵從中國禮儀的問題。

當耶穌會士以西儒的面貌在異鄉贏得聲望，甚至能立足於中國宮廷，但他們卻未因此而交了好運，反倒陷入結構性的惡性循環。雖然他們的名望逐漸擄獲了中國信徒的心，而他們的書信也打動了歐洲讀者，期盼中國成爲天主教王國的成員，「中華副省」(Vice-Province)並因此從日本獨立出來。教區

不斷擴大，信徒不斷增加，然而人員與資金短缺和管理信眾的問題也隨即浮現。只要他們在傳教上越成功，問題便越嚴重。這個陷阱成爲本書第一部份的主題，不斷反覆出現，也成爲徘徊在本書第二部份的魅影。伴隨著這個主題的則是反教、平反、教區擴張、處理中國禮儀等歷史事件的浮沉。當耶穌會士致力解決上述問題時，又必須應付其他天主教教團的競爭和內部不同的聲音；還得游移在葡萄牙、法國對於亞洲教權的爭奪和歐洲列強與教皇間聖、俗權力的角力。這個令人難以自拔的泥沼與歐洲宗教和政治上的鬥爭，終於摧毀了耶穌會士在華的傳教事業。

若本書的第一部份讓人覺得在歷史的結構與事件的韻律中，人沒有插手的能力，本書的第二部份則詳述耶穌會士在中國的種種作爲。即便他們未能克服噬人的歷史洪流，但那美好的一戰已經打過。也許耶穌會士只意識到他們只是傳播神的訊息，而不是和歷史作戰，但從人選的培育開始，他們便已回應默默無語的歷史結構。

耶穌會士把最好的人才留在歐洲，但來華的也不必然是二流的人選。他們必須通過耶穌會的學院訓練和層層的考核。來華的人通常也不是科學長才，而是對於異地傳教甚或殉教有興趣的青年。他們來華時大約二十來歲。耶穌會的訓練使他們習得了研究異地文化與傳教的方法，也正是教育統合了耶穌會跨國成員的視野。從葡萄牙到中國的一年，等同於耶穌會士最後修業的第三年實習。他們在船上習得如何照顧同伴和異教徒，如何主持彌撒和聆聽告解，如何分配人力，組織船上的成員參加儀式。這一年的實習，對他們日後的工作最有助益。

來華後的耶穌會士首先要面對學中文的問題。他們動員澳門出生的混血助手(*coadjutor*)，以溝通華文與歐洲語文；聘用中國士人指導入華教士之中文與儒家思想；早些入華的教士親自教導後進，甚至編纂教材，以便傳承教士與教士間學習華語的經驗。不幸的是入清後，隨著教區的擴大，新近入華的會士再也無心、也無力花在語言學習上，只得學一些簡單的日常會話。禮儀

之爭後，語言能力更與傳教無關。

在傳教方面，Brockey 非常強調耶穌會士所放牧的羊群大多是平民百姓，上層的士人只佔很小的部份。研究中國耶穌會史的人，對此論點當不陌生。早在二十世紀初年，陳垣分析 1616 年的迫害時，便已指出耶穌會士的信徒大部份是平民百姓。只因留下文本的人以士大夫為主，若完全仰賴中文文本，的確很容易令人誤解。然而重要的不僅在於 Brockey 提示了耶穌會士的信徒很多來自下層階級，更在於他以細緻的檔案鋪陳耶穌會士如何在平民間傳教。他們借助大量的宗教實物，以吸引信徒；並藉著毀去異教的宗教物品，重鑄信徒的身分。對於使用中文文獻的研究者，Brockey 描述耶穌會士如何引領中國教徒的宗教生活，頗值得參考，也是本書最大的貢獻。

Brockey 雖然從傳教士的史料，想重寫一部「由下而上」的耶穌會入華史，但重視士人信徒的傳統觀點也並非沒有道理。假如上層士大夫只佔信徒中的一小部份，那麼他們到底有多重要？尤其宗族在明清社會乃是主要的社會組織，宗族中的有力人士往往是影響其他族人信仰，乃至長期維持信仰的關鍵。另外，有地位信徒的護持，仍是避免政治迫害最好的方法。因此，耶穌會士著力使士人皈依，恐怕有部份是來自在地的智慧。在能力所及內，耶穌會士乃至其他教派，都不會忽略這些上層的人。就像本書作者所說的，耶穌會士在他們的書信與報告裡，常會詳細記載信徒入教的情形；但卻也總不吝惜篇幅提到他們吸引了什麼樣的上層的人士入教，甚或提及其洗名，而對於下層信眾則以數羊群的方式帶過。敘述的差異，也可看出耶穌會士並不曾忽視上層信眾，即使他們只佔一小部份。或許過度強調「由下而上」的觀點，因此 Brockey 認為 1633 年以後，很少有重要的官員入教，乃因這時的耶穌會士已紮根甚深，並不需要上層士人的保護（頁 91）。這個判斷只怕還待商榷。事實上可能是因為禮儀之爭、反教與頒布禁教令之故，耶穌會士越來越難吸引士人入教，才使上層信徒的數量大減。

有了信徒後，耶穌會士以「會」(confraternity)的方式組織信眾。尤其在

人力不足的情境下，組織信眾，分層領導，可以減輕會士的負擔，提高工作效率。Brockey 分析各種性質不同的會規，以理解當時信徒的分工方式與靈修的內容，如女性在教會中之職務，以及教導孩童入教等。中國的天主教徒留下不少中文會規，Brockey 則從歐洲文獻豐富了這些中文材料的歷史意涵。

Brockey 強調在中國的各種「會」，無論是「仁會」、「苦會」或「聖母會」，大體是耶穌會在歐洲組織信眾方式的橫向移植。然而「仁會」之善行，「苦會」之苦行與明清時期的慈善組織或「省過會」的雷同處，可能也難以忽視（頁 395）。尤其對教外人士而言，這類組織是否真能展示天主教的特性，並與中國其他的祕密宗教區隔，不無可疑。Brockey 從歐洲史的視角看來，這些會的組織乃歐洲天主教組織的延伸；但對於中國史的研究者而言，卻是文化混融的結果。當然，就主體經驗而言，信徒們，尤其是能以文字表達自己宗教感受的上層階級信徒，或許相當自覺自己的宗教實踐大大不同於中國本土的類似行爲。在地性的中國天主教史研究，當顧及天主教的客觀展現與信徒的主體經驗。

Brockey 是檔案高手，但也很會說故事。一般檔案研究可能寫得枯乾無趣，也很可能因有太多小軼事，而難以顧全大局。Brockey 的敘事通常以小故事開始，接到他所要談的問題，再托出一、二與課題相關的檔案材料，深入分析。Brockey 問的問題再具體不過了，都是些「細微末節」：對歷史學家而言，這正是單挑魔鬼的巢穴。如耶穌會士如何學中文？如何在下層民眾中傳福音？如何管理教區？然而正是這些細節的充填，使得 Brockey 的貢獻有別於其他學者，把耶穌會士的東遊描繪得栩栩如生。

雖說 Brockey 用他在歐洲能找到的巴別塔之磚，盡力將塔堆高。然而也正是在他的血汗中，讓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學者（或許也是所有歷史學者）見證到他們自身薛西佛斯式(Sisyphus)的宿命。即便 Brockey 說的是歐洲天主教在華的故事，他卻把法國教團排除掉了。法國教團獨立於中華副省，且在康熙朝影響重大。在神學思想上，他們則發展出不見容於教廷的「符象論」

(Figurism)。根據 Brockey，正是這群法國會士打破了耶穌會不分國籍的普世主義傳統。排除了這群人，Brockey 所建構的巴別塔也因而傾斜。然而這或許是上帝本旨：人命有限，豈能與神較量？歷史學者無能一窺歷史全貌的徒然努力，卻也增添了歷史這一行幾許悲涼。

在死亡的陰影下，歷史學者孤獨地堆砌巴別塔之磚，猶如耶穌會士在異地傳教的寂寞事業。面對獨一無二的上帝，重譯來華的耶穌會士大多時候只有孤寂為伴。他們航行於怒浪濤天的惡洋，孤單地面對死神；在景況不好時，他們得獨自面對漠然甚至懷有敵意的異鄉人；景況好時，他們獨行踽踽，逡巡在自己所放牧的羊群之間。即便像湯若望(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, 1591-1666)這樣曾在上帝所開的門縫中，窺見中國皇帝改宗希望的教士，終也在無情的迫害裡，獨自死去。唯一可以與他們相伴的其他修會教士，卻和他們像刺猬般地彼此搓磨。孤獨，終究是這些守貞男性的宿命。

然而，若與耶穌會士相伴的不是其他修會的教士，而是歐洲的兵士與拓殖者，也許耶穌會在華的努力，能像他們在別處一樣地開花結果，持續至今（頁 419）。Brockey 在書末不免作此臆測，彷彿只有訴諸武力與經濟力，上帝的福音才能從歐洲傳遍大地。Brockey 通往神國的巴別塔居然奠基在如此的揣想，不免令人一驚。

巴別塔已然傾圮。感謝上帝！